

陈尚君 著

陈尚君

XIN SHI JI XUE REN WEN CUN

自

选

集

新

世

纪

学

人

文

存

1952年6月出生于江苏南通，原籍浙江慈溪。1981年1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获文学硕士学位，留校任教。1995年晋升为中文系教授。1996年起担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点博士生导师。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。治学以唐宋文学基本文献的搜辑与考订为中心，兼及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，于史学、文献学等亦有所涉猎。著有《全唐诗补编》、《全唐文补编》、《唐代文学丛考》、《唐才子传校笺补正》（合作）、《唐文拾遗校订》等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陈尚君 著

新世纪学人文存

陈尚君

（自）
（选）
（集）

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陈尚君自选集 / 陈尚君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0. 11

(新世纪学人文存)

ISBN 7-5633-3117-4

I. 陈… II. 陈… III. ①陈尚君-文集 ②史籍-研究-中国-唐代-文集 ③史籍-研究-中国-五代 (907~960)-文集 ④文学研究-中国-宋代-文集 IV. K240.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817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电子信箱: pressz@public.glptt.gx.cn)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(广西南宁市建政东路 邮政编码: 530023)

开本: 889mm×1 194mm 1/24

印张: 18 插页: 4 字数: 372 千字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2 000 定价: 27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出 版 说 明

我社出版的《跨世纪学人文存》(23种)自问世以来,受到学术界和读者们的重视和欢迎,认为是新时期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总结性工程。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鼓舞。而今,我们接续前思,整理编辑近年学界新锐的重要成果,感到大美纷然,目不暇接。几经讨论,初辑九种,科学与人文兼收,精思与沉潜并重,而主脉不变,在乎平实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。我们深知,在此商业时代,要保持这种纯粹而深邃的关怀殊非易事,但是这种关怀却是不可或缺的,它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。我们力求为这样的关怀提供一种与读者对接的平台,以期为学术繁荣和民族进步尽一分绵薄之力。这套丛书与新的世纪同时来临,亦将与新世纪同行,故名之曰《新世纪学人文存》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0年11月

自序

一

作为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,我的起步是相当晚的。

1952年,我出生于江苏南通。父亲是会计,母亲是裁缝,都仅有小学文化程度,当然更说不上家学渊源了。刚进初中就碰上“文革”,没上几天课就“轰轰烈烈”了。以后去长江边上一个农场种了八年田,所幸碰上几位喜欢读书的朋友,“战天斗地”之余,居然囫圇吞枣般地从外语读到马列,从生物分类读到鲁迅、孔子。虽然20岁以后方读到《唐诗三百首》,似乎已注定我在唐诗研究方面入段希望渺茫,但当1977年初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复旦读书时,我对历史地理、中外作家的熟悉,颇使一些老师感到意外。

初进复旦时,我对文学与学术所知甚少,但仅隔一年多,在有关专业课刚开始恢复时,我即以专业第一、总分第二的成绩,破格录取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。能实现这一转变,我自感当时确很努力。经过十年的荒废和饥渴,一旦进入大学,面对数万册开架的图书,兴奋之情无以自抑。最初的一年,我一直以饿虎扑兔般的激情攫取各类知识。

从初一到大学毕业,正常情况下要读十年,我仅用了一年。同时,我也感谢两位老师:一位是陈允吉老师,他读书多,视野开阔,感觉敏锐,议论多机锋,我担任他的课代表时,他每周与我交谈数小时,以其渊博的学识,辅导我读书,使我眼界大开。另一位是任政治指导员的杨竞人老师,在我尚少自信之时,积极鼓励我报考研究生,使我了解到自己的能力。当时高考刚恢复,世人几乎不知研究生为何物,以致报考研究生时,高考落榜者知又有机会,争相报名。我能得到机会,很感庆幸。

导师朱东润先生当时已83岁高龄,仍精神矍铄,声如洪钟,每次上课都讲满两小时。记得第一次授课,讲如何读书,朱先生即要求不仅要读通读懂,而且要能力透纸背,读出表面文字没有包含的内容。朱先生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,早年留学英国,很推重英国传记文学的写法,一生致力的主要目标是在传记文学方面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。他治学讲究广博地占有史料,用自己的眼光审视历史,不为固有说法所囿,论著所及,无不机杼独出,识见迥绝。我跟他学唐宋文学,他告诫我:读书要耐得寂寞,下苦功夫,读书要能读出书面文字中没有表达出来的内蕴,做学问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,不要盲从古人、名人,记性好对做学问有利,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努力。甚至说到:好的学生应敢于对老师的说法提出质疑,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不会是好学生。第一年他对我之基础差颇多批评,学年考试出题《大历元年后之杜甫》,我用一个暑假写出长文,对宋以来视为定论的杜甫离蜀原因提出新说,与他的《杜甫叙论》持说亦不同。朱先生看后不以为忤,备加称许。他晚年对我寄予厚望,甚至说到我将给复旦带来光荣。感到愧疚的是,我后来并未能尝试他的治学道路,另走上考据辑逸一途,但就治学精神来说,我自信尚能有所薪传,无玷师训。

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复旦古典文学人材济济,盛极一时。世纪之交出生的一批老先生都还在世,各领风骚,中年一辈也多学界扬名,著作迭出,形成复旦学派。据我理解,复旦学派的治学特点,体现为气象博大,议论通达,重实证而多创新,且各具个性,自成面貌。在这一环境中读书、工作,使我得到多方面的教益和鼓舞。如我得通目录,即受教于王运熙先生。王先生当时是教研室主任,负责研究生基础课,每周

讲一次,他讲课条理清楚,切实可行,最便初学。他讲掌握目录学为治学关键,并指点从汉、隋二志入手,使我受益很大。他又讲到:作家以生活为创作源泉,学者应在读书中读出论题,也使我印象很深。我最初的文章,也都是王先生推荐发表的。有些未曾亲聆教诲的老师,也能间接学到为学的方法。如蒋天枢先生强调读书必先校书,学问是生死以之的事情,他的研究生告诉我,很受启发,后治唐诗,颇注意会校各本,凡经眼之书,皆有所记录。

同时,我也读到乾嘉到近代的众多学术大师的有关著作,从中汲取营养和方法,其中印象较深且对我之为学有启发的有:钱大昕讲为学应勤作札记,己之所见为前人已言者一律不存;劳格为学格言“实事求是、多闻阙疑”;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,他的考证要言不烦,常如锥刺直入;陈垣先生的史源学、年代学及“毋信人言,人皆诬汝也”的治学金言;陈寅恪先生善于从常见书中抉发内蕴的史料运用能力;余嘉锡先生之掌握目录以治学。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岑仲勉先生,他对唐代史料全面而精密的把握,对唐代历史巨细不遗、契入微芒的周密研究,确令我向往,叹为观止。我仔细读过他的几乎全部的著作,得益极大,在作唐诗文辑逸和各类考订时,皆刻意追仿其为学的严密精微,有几篇文章还有意追迹他曾做过的课题。

70年代末,以傅璇琮先生《唐代诗人丛考》一书出版为标志,国内唐代文学研究风气丕变,从一般的作家、作品研究,转向以实证为基础的多方位综合研究。在全面深入探讨文学与政治、文化、宗教、民族、艺术等等交互影响,探讨作者的生活道路及作品的特定内涵、流派与文体的发展过程等方面,对唐代文学基本文献建设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后,在程千帆、傅璇琮、周勋初、周祖谟等先生主持下,组织全国学人,完成了一系列大型著作的编纂。在我探索个人的发展道路时,也受到这一风气转变的影响,确定个人的选题计划,并在工作中得到上述各位先生与许多师友难以计数的支持和帮助。资料共享,疑义相质,视学术为天下公器,不以纠订商榷为违忤,我所接触的众多师友,在治学中都有这样的古风和气度。我以为,国内唐代文学近20年取得的远迈前人的巨大成绩,是与这一学术群体的精诚合作分不

开的,我身处其间也受益无穷。一位日本学者在评论我的工作说到:“陈尚君周围的研究者群体及出版界与他的密切合作,热心支持,也令人羡慕。”^①对此看得很清楚。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我还默默无闻时,即予以信任,委以重大选题,使我得以无所顾虑地从事纂述。

但就我个人来说,冥心孤往地走向文史考据、文献辑录的治学道路,也是按自己的能力、兴趣、性格所作之选择。由于青年时期的荒学,其后自学的不系统,入大学后的急速进学,我自感基础并不好,不如许多渊源有自、学养深厚的朋辈。议论、鉴赏类的文字也写过一些,但总感到较隔一层,达不到很高层次。朱先生认为我的长处是“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理清头绪”,对文献有特殊的敏感。就记忆能力来说,师友间多有称道,就对历史上的时、地、人、事、书诸方面的记忆理解和准确定位来说,我确有自信,但形象记忆与背诵能力则极差。唐人诗文至今也背不了许多,但对于数百上千作家生平出处、成千上万的典籍记载与诗文源流,则可如数家珍,有问必答。我读书兴趣较宽,颇多好奇心,对前人治学存疑未决处,尤其留心了解,长期积存,一旦见到前人未用的文献,很容易引起联想,不少问题因此得到解决。所谓学问悟性,大概就是如此。我想自己在学术上能做出一点成绩,除得到众多师友的提携、帮助外,还在于能扬长避短,常卑以自持,将勤补拙,多思不懈。

二

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,大多偏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,研究论文选题大多以作者为中心,这一倾向到70年代末我开始研究工作时,还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研究生第一年,朱先生领着读了许多唐宋时期一流作家的诗文,我也按他的要求,读了一批大作家的别集,包括唐代的李杜韩柳,北宋的欧苏王黄,都曾通读过一遍。诚如朱先生所言,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,是这批一流大家,只有熟读了他们的作品,才能如高峰远眺,一览众

山,才能俯瞰各家,评鹭得度。虽然前人对大家的研究一般均较充分,提出新见不易,但也应先从此入手。如因不易创说而回避大家,只读二三流的作家作品,眼光不免要受局限。我第一次独立研究的题目,是朱先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给的考试题目:《大历元年后之杜甫》,要求暑假间完成。此前我已读过冯至的《杜甫传》、萧涤非的《杜甫研究》,朱先生的《杜甫叙论》当时还未出版,但基本见解已在全系作过报告,如归纳各家见解以成文,当然不难完成,但总觉太过平庸了。记得当时将能借到的杜集,从通行的几种宋人注本,到清代钱、仇、浦、杨诸注本及今人论著,全部借到手,用了整整一个暑假,方得成文。杜甫从蜀中安居到离蜀东行,是晚年生活的转折点,前人一般认为他离蜀是因严武之死,失去庇护,只能东行,只有清代浦起龙曾提出疑问,但未作进一步论证。我详细比证了各种文献,特别是勾稽了杜甫晚年大量而零星的自述,证明他离开成都在严武去世以前,他离蜀的直接原因是拟入长安郎署,其所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并非全属虚衔,按当时职官制度为未实授的官职,其入幕与授郎并非同时之事,故授郎后即拟取道荆襄入京,但却因卧病峡中而迟滞,并最终只能飘泊湖湘,依栖幕府为生。这一说法,与历来杜诗研究者的看法都不同,对杜甫晚年行踪和创作的研究影响很大。后来承美国友人转告方知道,旅美学者洪业曾提出类似看法,只是我至今尚未读到他的论述。现在看来,此文细节虽尚有可推敲处,结论还是基本可信的。

当时我很推重夏承焘先生所著《唐宋词人年谱》。夏著于词人生平资料搜集极勤,但编纂方法则较依循传统,重在排比罗列,间加考订。我选取其中若干家,逐条复核,细心推衍,对温庭筠生年和姜夔卒年提出了较可靠的新说,与夏说相去甚远。前者对温庭筠一首自叙生平的长诗中所涉人事提出新解,并据以确定温氏生于801年,较夏说提前十二年,并进而推定温氏早年经历及受文、武间政治事件的牵累。所写《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》一文,在《中华文史论丛》刊出,近二十年间的温氏生平研究,多从拙说延展出来,我考订未密处,也得到不少精当的订正。姜夔卒年,夏说定在1221年,根据是韩洄一首讲到姜与潘德久去世已三年的诗,他据韩卒在1224年倒推而得。我仍据这首诗,考知潘

即潘耒,四灵中的徐照、徐玠都有诗祭悼他,而徐玠死在1211年,有叶适的墓志可证,这样用三环相套的考证,定为1209年,比夏著提前12年。唐圭璋先生读后,认为可作结论。上述二文,主要依据都是前人已提供了的,但在推衍证明方面,比前贤更求精密准确。1986年,曾写出长达四万多字的长文《花间词人事辑》,力图廓清明清词家据辗转引录的后出文献对花间词人生平的误记,征引可靠的唐宋文献,排列出这一词派18位作者长达170年的活动年表,为这一词派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凭。不少文献是首次揭出,如张泌、张曙疑为一人、鹿虔虔前蜀为宦、魏承班死于前蜀败亡之际、毛文锡不及见后蜀、后蜀五鬼出于虚构等,也发前人所未言。同时有一短文谈晏几道生歿年代,也较夏说各推后了若干年,近年有人在江西的晏氏家谱中找到晏氏准确年代,与拙见较为接近。

1980年,考虑研究生论文选题时,总觉唐代不易写出新意,毫不犹豫地选做宋代。最初拟作南宋刘克庄研究,为此通检了南宋中后期近二百种文集,重新排比了刘的年谱,写了几万字的《后村词系年考证》,但看到的文学现象显得很零碎,以当时的能力和眼光似乎无从着手,只能放弃。继而转治欧阳修,仍然从第一手文献的阅读、抄检和排比开始,对其生平、著作、交友及文学活动作了全面清理,写了年谱和著述考,对其各方面文学成就都作了评述,并以此为契机试图探讨北宋文学风气转变的原因,写成学位论文《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革新的成功》。

以上所述是我从学之初所做的一些工作,所据基本文献大多还是前人已揭示出来的,坚持从原始文献的阅读入手,但对文献的搜寻和理解,大都还是盲目、隔膜或无序的。以后因从事唐诗文辑逸考证,所见渐广,才得有可能全面把握和驾驭一代文献。而以上述研究为发端的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,则是我始终非常关注并曾有很可观的创获。

前人对唐诗的研究,比较集中在二三十位大作家,特别是李杜、韩柳等人上,宋代就有千家注杜、五百家注韩的说法。唐代作家有作品存世者超过5000人,成就高下相距悬殊。但如要全面、系统地了解有唐一代文学总貌,自然应该先将所有文学现象梳理清楚,这就需要对包括中小作家在内的所有作家作全面的了解。傅璇琮先生在《唐代诗人丛

考》中将研究重心放在初盛唐 30 多位次一流作家身上,改变了一般学者研究的视点。我与一批学者共同努力,则试图弄清全部唐代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情况。我所作除一些单篇论文外,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:一、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唐五代卷》,我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撰稿量,约 2000 条,30 万字。此书重点为唐五代中小作家作传,收录范围十分广泛,凡有诗句存世者,凡有别集或与文学有关著作见于记载者,乃至诗文注家、类书辑录者、史传作者、杂史及杂著作者,从事译经义解、俗讲的僧人,概予收录。记得初拟条目约 2500 条,我陆续增补了约 1500 条。在主编严格要求下,全书内容均出自第一手考察资料,作了周密考订,至少有千余名作者是首次被揭出研究。这部辞书完全可视为原创性学术著作。二、《唐诗大辞典》,我写了作者条目 1400 条。此书出版较前书早两年,但我作部分均为前书的节写。上述两书中,凡新见作者、僻冷作者,一般认为无事迹可考的作者,都由我执笔。三、《唐才子传校笺》补正。《唐才子传》录唐诗人 398 人传记,原作者为元人辛文房,错误较多;80 年代末,傅璇琮组织了部分国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,合作完成了四卷本《唐才子传校笺》。受傅先生的启发,湘潭师院陶敏教授与我本着是正、补充、使之更趋完备的精神,先后各草写了十几万字,稍作加工,合而成书,是为《唐才子传校笺》第五册。陶先生与我虽无分工,但研究重点不同:陶重在以作品所涉人事,以揭示内蕴,重定年代;我则较多地提出前四册作者未曾引用的冷僻或后出文献以补充事迹。四、《辞海》1989、1999 年版的修订,唐宋文学部分全由我执笔,充分利用前人已有成绩和个人研究所获,改动量很大,多求准确而有新意。五、全唐诗文补遗中新见作家,估计超过 1500 人,都据所知提供了小传。

作家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中较有规范可循的基础研究,作家生平考索又是作家研究的基础工作。现今各种古籍不少都编有人名索引,各代人物传记汇编检索利用也较方便,这些只要掌握基本研究技能就能胜任,难度并不太大。我从最初的大作家研究入手,进而勾稽一代作者之生平,除充分利用了各种工具书外,还得力于平日多方留心,得以揭示出许多时人不太注意的文献,解决了一系列悬疑未决的问题。

三

80年代至90年代初,我的主要工作是作全唐诗文补遗,独立完成了《全唐诗补编》(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)和《全唐文补编》(中华书局即出)二书。

在为学未深之时,我对唐代文学研究总的印象是,前人已做了大量杰出的工作,特别是在文献整理方面,几乎可说已应有尽有,个别材料的理解容有出入,要有大的突破和建树似已较困难。研究生期间我虽也写过几篇唐代诗人生平研究的文字,但当确定毕业论文选题时,还是毫不犹豫地转向宋代。也许是因最初对唐代文学史料存有兴趣,在广泛涉及宋代文献时多存了点心眼,偶然发现在宋人所著《会稽掇英总集》、《庐山记》、《天台集》等书中,竟还有为数不少的唐诗为《全唐诗》所不收。当时知道孙望、童养年等先生在从事唐诗补遗,我的不经意发现想来已都是他们的囊中之物,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。直到1982年底见到中华书局新出的《全唐诗外编》,收录王重民及孙、童三先生之四种辑本,搜罗虽富,却仍有网漏吞舟处:我所知者仍有近二百首未收。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。唐诗辑逸考证,迭经历代无数学者努力,向以严密周详著称,为何还有如许之阙遗?我未曾专攻,即累有所见,如发愿穷求,有计划地作大规模的网罗,应该会有更可观的收获。

我的努力从两方面同时展开。

一方面,是对前人已做的唐诗汇录辑佚工作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。前辈学者如岑仲勉、闻一多、李嘉言等对《全唐诗》的校订之作给了我许多指示,可据知《全唐诗》存在伪误的各种类型,周勳初先生《叙〈全唐诗〉成书经过》则直接证明了《全唐诗》在康熙间迅速成书的秘密,在于利用了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和李振宜《全唐诗》的已有成果,略事增订而成。由于当时还无从见到平冈武夫的《唐代的诗篇》和台湾影印的《全唐诗稿本》,我利用其时能找到的《唐音戊签》、吴琯《唐诗纪》及《全

唐诗》、《全唐诗外编》，逐卷逐条翻检，得以列出前人辑录唐诗的已用书目，并对部分用书与《全唐诗》作了逐篇的复核。经此番摸底，清楚地看到，清定《全唐诗》成书于朴学兴起以前，预修的十位学士通辞章而不善考据，迫于王命也无暇广事搜罗，其所据为明末以来张之象、吴琯、胡震亨、钱谦益、季振宜的积累，仅略据新得见的《唐百家诗选》、《分门纂类唐歌诗》、《古今岁时杂咏》等稍事补辑。胡、季等人虽曾广事搜罗，细作校订，季氏藏书尤富，但他们生活在明末空疏的学术风气中，虽卓出时流，但仍不免受时风左右，录诗多不注所出，又多据后出书转引，皆属显例。为《全唐诗》作补遗诸家，市河世宁仅据日本文献，王重民全取敦煌遗书，孙、童取资较宽，但似亦均就所知搜罗，未曾备征文献。经此调查，对前人已有工作得以了然于胸，唐诗辑存虽经无数学人努力，但距网罗无遗，相去尚远。

另一方面，我对唐人著述总目和今存唐宋典籍情况，也作了全面的调查。唐一代著述，当然以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收录最富，如加上唐宋书志及其他记载，尚可倍之，但流传至今，仅是很少一部分，大部分散逸了。散逸的过程绵历千年，亡书虽如流星般殒落，但其残逸的片断如同陨石般散落在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各类典籍中。分析各种书志后，我得到大量线索。同时，调查现存各类典籍要方便得多。掌握了上述书目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：前人已用书目，仅是现存书目中的很少一部分。清中叶以后海禁渐开，域外汉籍流回，加上公私藏书的散出，地下文献和敦煌遗书的发现，我们今日能看到的材料，较古人不知要丰富多少。仅以佛藏来说，清代一般学者连收书最少的《龙藏》也不易见到，今日较易见到的几种藏经，存书即超过《龙藏》四五倍。

前人说目录学可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，又说目录为治学之钥。我从掌握目录入手，全面把握文献，对唐诗作竭泽而渔式的网罗，得逸诗4663首，相当于前此各家所得总和之二倍半，收获之丰，大大超过了预期目的。

此书编纂工作量之大，所涉问题之纷繁难解，亦非我始料所能及。就用书量来说，既要作全面网罗，有关之书均应检及，估计先后检书逾5000种，仅方志即检过2000多种。对所用之书，也尽量追求善本、足

本,对不少书之年代、作者、真伪也分别有所考订,有些还留意辑逸。至于各书拔检,更谈何容易。我生性笃钝,读书不敢存任何机心,见典籍引诗,皆与《全唐诗》逐条对检,虽费时极多,但唯此方能将前人遗珠逐一检出。其中于宋代几十种类书、地志,费时最多,因其保存丰富而又极芜杂,又唐宋诗混杂,鉴别不易。凡此皆曾反复推寻,从唐宋两方面寻证,以定其是否唐人逸作。即便从某书中检出某人诗,《全唐诗》该人下未收,也不能即定为即逸诗,因唐诗流传千载,传误情况极其严重,仅《全唐诗》中重出误收之诗即多达 6800 多首。不加鉴别,录出无以征信。有鉴于此,我于所录诗多曾从作者事迹、载录源流、互见与否等多方面严加考订,信者存之,伪者删之,疑不能断者加按附存,以便读者利用。

为作此书,多年竭尽心力,凡能发现之线索,皆穷求不已,以期有所收获。所得之富,亦差可自慰。其中新见作者逾 800 人,为许多大作家补录了遗篇,如杜甫补得一首,为南宋后惟一可靠的发现,白居易、元稹、宋之问等,新补逾数十篇。许多诗对研究唐诗发展,有重要价值。此书出版后,得到中外学界广泛好评,并多次获奖。

从 1989 年开始,参与重编《全唐诗》,并忝为主编之一。此事于 50 年代由李嘉言先生提出,60 年代做了一段工作,后因故停顿,他本人也已去世多年。现在采取多方合作的方式,我承担了全书中最烦琐的部分。书名拟作《全唐五代诗》,学术目标定得较高,希望做到广搜善本,详出校记,伪误尽删,收录全备,能反映当代学术水平。初盛唐部分已接近完成,出版恐尚需相当时日。

《全唐诗补编》交稿后,中华书局又约我纂辑《全唐文补编》。有了前书的辑校经验,对需用各书也多已有所了解,补录遗文似乎要容易一些,至少在进行之初颇为乐观。但实际进行,则历时近六年,从 1986 年着手,至 1991 年方完成,其间艰难曲折,备尝经历,程功之巨,大大超过补诗。

从表面上看,补文比补诗在辑录或鉴别两方面都要容易。从辑录来说,子、史两类书引诗相对较少,即有亦仅寥寥几句,程功巨而所得少;文则不同,正史、政书、类书、地志、石刻之类常披卷皆是,辑得一篇,

篇幅亦颇可观。从鉴别来说,文多存作者及史实,较易考镜,且辗转流传致误的情况相对来说亦较诗为少。这些也确是事实。

辑文之艰难,工作展开后方有切身之感。

首先是前人所做唐文辑录的工作质量远胜于唐诗。《全唐文》成书于乾嘉朴学极盛时期,主持其事的徐松为学渊博而精密,所定体例也颇周详。当日虽有陈邦彦《全唐文》160册为基础,另组织人力对四部典籍、《永乐大典》、释道两藏、方志碑帖作了广泛的搜罗,成书后又经顾千里、孙星衍等校刊,程功远迈于《全唐诗》。为之作补遗的陆心源又是清季最负盛名的私人藏书家,所补二书存文逾3000篇。在我着手进行后不久,又闻周绍良主编的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已编藏,为避重复,出版社建议拙辑不收近世所出墓志。尽管如此,我仍在前人所得以外,另录得唐人遗文逾6000篇,相当前人所得唐文的四分之一强。如此丰富的收获,得益于涉猎范围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视野。

其次,所涉至广,举凡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上至天文地理,下及鸡毛蒜皮,可以说无所不包。唐诗虽也涉典故、史实、人事、制度,主要还是文学作品,理解判读较易。文的限定较宽,举凡非诗、非专著的单篇文章,一概应予辑存,其中属于文学性的散文仅占一部分,其余为各类应用文字,如制诰、表奏、书启、判词、序赞等,涉及制度、法令、民族、宗教、军事、文化等各个方面。为使所录臻善,只有强迫自己尽量去深入了解各项专学。经此历练,为学面也相应得以拓展。

再次,文之校录有其特殊的困难。虽说文之摘引和传误不似诗之繁剧,但见诸征引者差别亦很大。见诸史传者,一文常因全引、摘句或撮录大意而形似数文。制诰、表奏之类,尤多代拟之作,作者常易引起分歧。皇帝即位诏书史籍有时全录原文,有时撮述大意,在政书中则分别节引,一文而衍化成不同形式的多篇文章,稍不注意就会出错。最麻烦的,还是见于石刻、写本文章的校录。以石刻言,刻石本身有断碑漫漶,拓本又有早晚、精粗及存字多寡之分,据拓本认字不易,据前人录文又多鲁鱼豕亥之讹。至于录自敦煌遗书者,原卷本多潦草不清处,我又仅能用到《敦煌宝藏》和缩微胶卷,要全部辨认写定,委实不易。

以上种种难端,经不懈努力,终皆得到圆满的解决。最后成书160

卷,存文逾 6200 多篇,使今存唐文总数超过了 3 万篇,且其中有大量极珍贵而稀见的文献,对唐代各方面研究皆有相当意义。

四

中国古代学者治学,不太讲究学科的区别,所谓“一事不知,儒者之耻”,可知当时学者对知识拥有求宽求博的态度。现代学科界限区分严格,自然是一种进步,但如研究古代文史,就很难完全分得清楚。今人常说的“文史哲不分家”,特别适用于古代文学研究。在一定程度上说,我是按传统治学方式治学的,加上一直致力于唐代基本文献的研究,近年更有意向前后拓展,治学中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定,已做工作早已突破了文学的范围,一定要按现代学科来说,大约能勉强列入历史和文献两科。传统文献学多讲目录、版本、校勘,现代文献学则讲图书的分类、编目、检索,对此我均有所了解,并多次开课,但大多只是作为展开研究的手段,而不作为研究的对象,即只研究文献,不研究文献学。与历史有关者,也大多是从专书研究入手。

我较早作的两篇文献研究论文是《杜诗早期流传考》和《欧阳修著述考》:前者试图网罗唐宋时期的各种零碎记录,追索宋注杜集中的蛛丝马迹,以探寻王洙结集《杜工部集》以前各种杜集的面貌,特别是六十卷本杜集的内容编次;后文则罗列了欧阳修一生著述五十种,分别考清其著述结集过程、内容大概及真伪存逸情况。其后因作全唐诗文补遗,所见渐广,颇有志于作汇考一代典籍的《唐人著述考》,希望借此能备存唐一代的著作总目,每一书下备载历代著录、流传存逸、著述始末、内容要旨,存者宜说明传本优劣完残,逸者应予以钩稽网罗。这一考虑所涉太广,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,但为此作了不少前期的准备,在专书辨伪、考订、辑逸、汇目方面写了一批文字。

古代典籍和作品流传中出现传误、依托甚至伪作,历代都有,前人所作《伪书通考》、《续伪书通考》即收录伪书数百种。唐代诗文的传误

情况更为严重,原因也很复杂,细加区分能列出几十项。陈垣作《校勘学释例》,是参校了《元典章》,我相信如以唐诗为例证,会更精彩。先后所作,有《全唐诗误收诗考》,考出《全唐诗》收入的魏晋南北朝和宋以后诗 700 多首,作了分类研究,希望找出传误的规律;《〈全唐诗〉补遗六种札记》,指出市河世宁《全唐诗逸》以下六种补遗专书中误收、重收诗数百例;《再续劳格读〈全唐文〉札记》、《读〈唐文拾遗〉札记》,继劳格、岑仲勉以后,指出《全唐文》错误 700 多例,指出陆心源补文出入亦近百例。我所辑出的唐诗文,也经过严格的鉴别祛伪,只是许多伪作删去而未形诸文字。以上各项所考,大多具体而琐碎,圈内人颇致好评,圈外人关心较少。在上述大量工作基础上,提出《二十四诗品》伪作说,在我是顺理成章之作,许多了解不够的学者则颇感意外和震撼。

《二十四诗品》是以流丽的四言诗写成的诗评,清初以后影响很大,从道光至今一个半世纪,已有 20 多种研究专著,译成多国文字,为中外文学批评界所重视,我也很喜欢。但从 80 年代初开始,我就存有疑惑,为何唐人著作,现在能看到的序跋著录却始于明末,这不符合一般古籍的流通惯例,然亦未加详考。到 1993 年夏天,在读书中解决了两个难题:一是从明代博学大家杨慎、胡应麟、胡震亨、许学夷四人著作中,发现他们都推重司空图的诗论,二胡还曾罗列所有可以考知的唐代论诗著作,但却一律没有提到《二十四诗品》,可知当时还没有司空图作此书的说法;二是证明苏轼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“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”一句,只是指司空图在《与李生论诗书》中列举了自己所作诗歌的两句一韵的二十四个例子,与《二十四诗品》并无关系。有了这两点确证,我于是决心深入推证,搞清原委。当时这部书不是司空图也不是唐人所作,已可看清,但迟至何时,从何处而来,则仍不能明。汪涌豪博士长于诗学范畴的研究,我便与他合作试图加以解决。不久,这一合作取得了进展,这就是发现了明刊本《诗家一指》是传伪的来源。《诗家一指》的第三节《二十四品》,与《二十四诗品》大致相同,明末许学夷看到过《诗家一指》,以为出于元人,又讥斥《二十四品》“卑浅不足言”。有了可靠的书证,我们于 1994 年夏完成了三万多字的论文《司空图〈二十四诗品〉辨伪》。此文于 1994、1995 年两次国际会议上提出后,引起热